

“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人”
在何处？“现代精神”在哪里？

王朔：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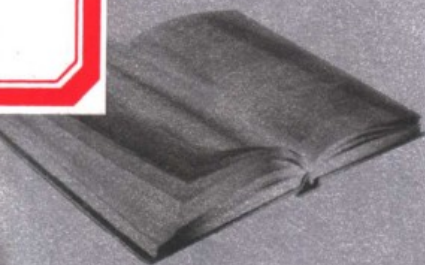
文坛三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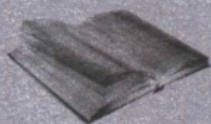
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 鸟变的。

余秋雨：说声忏悔不容易……

王彬彬 / 著

[大象论坛]





·责任编辑 孟建华·

·书籍设计 张 胜·

ISBN 7-5347-2717-0



9 787534 727177 >

ISBN7-5347-2717-0/I · 123

定价: 18.50 元



I206.7
W110



郑州大学

04010226190P

王彬彬 / 著

“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人”在何处？“现代精神”在哪里？

王朔：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

文坛三户

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 鸟变的

余秋雨：说声忏悔不容易……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
王彬彬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2
(大象论坛)
ISBN 7-5347-2717-0

I.文… II.王… III.①金庸-文学研究②王朔-文学研
究③余秋雨-文学研究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461 号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霍王张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18.50 元

自序

把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放在一起，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三人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几年前，王朔突然对金庸发起猛烈攻击后，颇有几位学术界内外的“金迷”在为金庸辩护时，以满是委屈的口吻，说王朔与金庸本是一类人，说他们既崇拜金庸也热爱王朔，如今王朔非但不与“金大侠”惺惺相惜，却一口一个“金师傅”地极尽嘲骂之能事，这种“同类相残”真令他们痛心不已。这些人的痛心，固然让我觉得可笑，但他们强调王朔与金庸本是同类，却也让我感到他们目光的准确。至于余秋雨，在与老侠的对话集《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也“骂”

到过。我既厌恶王朔也反感余秋雨，但我也想，王朔与余秋雨也有某种本质的相似之处，因此王的贬余，也具有同类相残的意味。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个人，在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作品的外在形态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

在雅俗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三人的相同处之一。有的作家在“圈子”内，在文坛上，影响颇大，但在大众读者中却谈不上有什么声望，作品进入不了“寻常百姓家”；有的作家在大众读者中很有市场，但在“圈子”内，在文坛上，则不被认可，作品“不登大雅之堂”。而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个人，则能脚踏雅俗两界，既是雅界的热点，又是俗界的宠儿。在“圈子”内，在文坛上，他们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评说，被一些文学身份很“雅”的人大为推崇，甚至被说成是最高雅文学；在“圈子”之外，在文坛之下，他们的作品也有广大的读者。所谓“雅俗共赏”，似乎真在他们那里实现了。在同一时代同时具有这种“好运”，说明在文学内涵上，在文化品格上，三者确有相似、相近和相通之处。

当然，仅仅在雅俗两界都有较大影响，还不是把金庸、王朔、余秋雨作为“同类项”来“合并”的充足理由。说他们在雅俗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指在雅俗两界都有不少人热烈甚至狂热地称颂他们，也指在雅俗两界都有不少人尖锐甚至尖刻地批判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金庸、王朔、余秋雨是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得到最广泛评说的三个作家。数年间，谈论、研究他们的文章，数量之多，恐怕是没有第四个人可以与他们相比的。而这些文章，往往又表现为肯定与否定的针锋相对，于是，对他们的评说，便体

现为激烈的论争。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王朔的论争、关于余秋雨的论争，可以说是此间中国大陆文坛的三大文学论争。在同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引起广泛的争议，也是把他们作为“同类项”的一种理由。

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当然，他们的“帮忙”和“帮闲”，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对“忙”和“闲”的“帮”，在方式和姿态上，也是各有特色的。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由于本书着眼点是“论争”，所以并没有将三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论，而是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在开始写作前，我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把对论争本身的考察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结合起来，亦即在对论争本身进行清理、指出双方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思考，既不流于对论争的客观综述，也不越过论争而一味地表达自己对这三人的理解。换句话说，本书从事的是“批评的批评”，对原有的批评对象的想法，应该通过对批评的批评表达出来。但在具体的写作中，二者却并非总结得很好。在有的章节中，论争双方的观点罗列得过多，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则表达得很零碎，第六章“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定位”就有这种缺陷。在有的章节中，论争双方的观点又显示得很不够，只顾自己在那里高谈阔论，第四章“王朔与‘鸳鸯蝴蝶派’”就有这种毛病。写完以后通读一遍，明显感到各章之间在质量上的不平衡，比较起来稍稍满意一点的，是第五章和第七章，但也

4 自序

是在这两章里，还有些可说的话未能说出来。

因新到大学教书，备课和讲课占去了大量时间，所以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有时候，一章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放下，甚至一放几个月。待到再次拣起时，需要把当初看过的资料重新看一遍，才能接着写。除了备课和讲课外，还有总也做不完的琐事。可以说，这本小书，是见缝插针地赶出来的。

现供职于《北京文学》的萧夏林兄，在资料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也从北京的李建军兄和湖南的余开伟先生处受益，在此亦表示谢意。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酷热中于南京



目 录

1 自序

第一编 衡金庸之轻重

- 3 第一章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23 第二章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23 一、历史的回顾
35 二、何满子的愤激
42 三、钱理群的模糊
47 四、刘再复的谬误
69 第三章 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
69 一、“人”在何处
77 二、“现代精神”质疑
92 三、孙悟空的跟头与如来佛的手心
103 附：面对“金迷”

第二编 论王朔之短长

- 121 第四章 王朔与“鸳鸯蝴蝶派”
121 一、“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
129 二、“应该说真不幸，我成了这样……”
139 三、“反正我敢糟践自个儿”
151 四、余论：亟须确立通俗文学批评标准
171 第五章 王朔与“大院文化”

- 171 一、“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179 二、“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
196 三、“强奸一次是强奸，再强奸一次就
成夫妻了？”

第三编 辨余秋雨之是非

- 207 第六章 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定位
207 一、从颂歌合唱到“骂”声如潮
211 二、颂歌合唱中的几种声调
226 三、否定的声音及其评析
243 四、几种特别中肯的说法
252 第七章 余秋雨是否应该忏悔
252 一、问题的提起
263 二、余杰有多大失误
286 三、余秋雨为何不忏悔



第一编

衡金庸之轻重

第一章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对金庸的研究，已被堂而皇之地称为“金学”。供职于由金庸任院长的浙江大学文学学院的徐岱先生，^①原本是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业的，此前似乎并未涉足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但现在也跻身于“金学家”行列，不但致力于对金庸小说艺术价值的探究，而且每每对那些敢于非议金庸者以迎头痛击。在为反驳袁良骏而作的

① 1999年4月1日《文学报》所载《久封碧血剑 今朝执教鞭》一文中说，金庸出任新浙江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后，“谁任常务副院长？外界猜测颇多，原浙江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徐岱可能性比较大”。

《批评的理念与姿态》^①一文中，徐岱先生对袁良骏批评金庸时的“理念与姿态”进行了批评，他告诫人们：“对于批评家本身来说，他不应该向大伙儿掩饰其‘个体’身份。这并不是诚实问题，它关系到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之批评的合法存在。……即使他不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应该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为反驳王朔而作的《昔日顽主不再好玩》^②一文中，徐岱先生虽对王朔的“骂”金庸报以尖刻的嘲讽，但同时也认为王朔“批评的理念与姿态”是“个人化”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王朔的文章也并非一无可取。比如讲这篇东西处处显示着一种个人化立场，就如作者事后所声明的那样，是‘很个人化的一篇读后感’。这样对方即便听着刺耳，但心里还比较踏实，没有文学之外的压力。不像有些职业批评家，明明也是个人意见，却总爱打着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不仅老想迫使别人就范，而且还不容别人反驳。相比之下，王朔此文仿佛有意露出自己破绽让人来出击的模样，倒显得十分难得。”徐岱先生的意思是，要说金庸不好，就只能说仅仅是自己不喜欢，不能借也还有其他人不喜欢来“壮大声势”，来证明金庸确实不好。这种“个人化”的要求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就算徐岱先生对敢于非议金庸者所定的这条规则是合理的，那么，同样的规则也就应该是为称颂金庸者所遵守的。任何人在称颂金庸时，也只能表达“个人化”的意见，借其他还有多少人也喜欢金庸来“壮大声势”，来证明金庸确实好，也同样是“犯规”的，也同样意味着批评的“悲

① 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② 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哀”。然而，制定这条规则的徐岱先生，在要求他人遵守这条规则的同时，自己就犯了规。所谓“不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不应该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难道不正是在借“群众”和“众人”来壮大声势吗？在《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一文中，徐岱先生在再三强调批评必须是“个人化”的之后，紧接着便说：“对于金庸小说能如此这般地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批评没有理由不予重视。”这不是在“以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要求批评对金庸小说予以“重视”又是什么？既然批评应该是“个人化”的，那么一个批评家是否“重视”某个作家，就应该完全基于自己“个人化”的感受、理解、判断。如果自己“个人化”地觉得一个作家不值得“重视”，那就算这个作家“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也照样应该嗤之以鼻；如果自己“个人化”地觉得一个作家很值得“重视”，那就算这个作家“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轻蔑，也照样应该庄重地对待他、研究他。而徐岱先生在对待金庸的问题上，却实行着“双重标准”。要求他人在非议金庸时，必须是绝对“个人化”的，不能借助别的人来“壮大声势”，否则便是“拉大旗作虎皮”，便是“伪批评家”，而要求他人“重视”金庸时，却又拉扯上“群众”、“众人”、“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要说这是一种“霸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当然不仅是徐岱先生，几乎所有称颂金庸者，几乎所有呼吁对金庸予以“重视”者，都必然要以“群众”和“众人”的名义来说话，都必然要以“集体和团队”的代言人自居，都必须以“受到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来证明金庸的价值。这并不奇怪，因为失去了“群众”和“众人”，

失去了“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金庸的价值似乎也就失去了依托。曹雪芹的受重视，并不是因为有无数以亿计的“曹迷”；鲁迅的受推崇，并不是因为有广大的“鲁迷”；沈从文、老舍、巴金的文学地位，也不奠基于数量惊人的读者。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作品自身内在的艺术价值而获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认可的。读者多一点或少一点，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很少有人称颂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等作家时，首先强调他们作品的发行量，强调他们如何受“不同阶层与年龄的人们的喜爱”。而金庸不同。金庸是先拥有了数量惊人的读者，然后再挟“集体和团队”之势要求批评界和学术界予以承认和重视的。所谓“金学家”中许多人，之所以迷恋和研究金庸，最初都并非基于“个人化”的感受和理解，而是被“金迷”的千军万马所裹挟从而失去了“个人化”的立场，投身于拜“金”主义者行列的。就以为金庸进入“大雅之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北京大学名教授严家炎先生为例吧。严家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接触金庸是受了学生们的影响，并且说：“我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督促之下。”^① 不仅一开始阅读金庸是受了“金迷”们的影响，而且此后的“思考乃至研究”都在“金迷”们的“推动、督促之下”，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个人化”的“理念与姿态”呢？既然金庸拥有如此多的迷恋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作品呢？既然金庸拥有如此多的迷恋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肯定、称颂乃至崇拜他呢？——所谓

① 见宫苏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载《光明日报》1999年2月26日。

“影响”、所谓“推动”、所谓“督促”，不就是这种意思吗？正因为一开始就是被“金迷”们裹挟着走，所以，在强调金庸的价值时，总是首先将金庸小说已发行了数千万套、“金庸热”已持续了数十年作为重要证据。没有了这一条，金庸还能成为今日的金庸吗？没有了这一条，金庸的价值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金庸的进入“大雅之堂”，是自下而上鼓噪的结果。

金庸的称颂者们非常清楚，仅仅说金庸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还不足以证明金庸有非凡的文学价值，还必须同时强调，在“金迷”中，不仅有“俗人”，还有很多“雅人”。也就是说，金庸小说是达到了所谓“雅俗共赏”这样一种极高的境界的。徐岱先生在以“集体和团队”的名义要求批评家“重视”金庸时，特意强调金庸拥有“不同阶层”的读者，用意正在于此。“雅俗共赏”，是从“雅”到“俗”的金庸称颂者用来证明金庸非凡价值的最重要的证据。先说金庸拥有数量惊人的读者，再强调金庸迷恋者中也有许多“雅人”，并开出一份“金庸雅迷”的名单——这几乎成了不同层次的“金学家”们称颂金庸、反驳非议者时的一种套路、一种程式。仍以严家炎先生为例。严家炎先生多次强调过金庸小说读者数量既多，层次也很丰富，并专门撰有《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①一文。文章一开头，严家炎先生便指出，金庸小说当初在报纸上连载时，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而三十六册一套的单行本问世后，截至一九九四年，正式印行的已达四千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而各地的盗版比正式印行的还多，“所以，金庸

① 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1日。